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播 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

李 爽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入使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中关于社会构造、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变革的分析, 从社会表象中揭开了社会本质特征, 解决了中国在道路选择上的困惑。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 以社会主义为发展趋向, 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提出了中国革命基本理论和实践方式, 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中国共产党; 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 A8; D0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3909(2011)09 - 0022 - 04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过程, 也是逐渐认识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李大钊在日本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后, 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四运动后, 陈独秀从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也是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后来写成了《社会学大纲》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瞿秋白则是从俄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他还在出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时, 主讲“社会哲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两门课程。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等人也曾在该系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相关课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了社会构造内涵、社会变迁规律和社会变革手段, 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原则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亡之路, 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危局。封建的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底层民众遭遇封建势

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这种状况下, 传统文化体系与近代社会变革的需求产生了矛盾。社会学就是在这潮流下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学起源于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 在发展过程中分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和孔德系社会学派。社会学引进之初, 孔德系社会学, 将西方世界中流行的契约社会学说、生物社会学说和心理社会学说作为研究依据, 是当时中国社会学中的主流。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未引起普通学者的足够重视。早期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 在研究中逐渐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内的指导性价值。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专门的社会学著述, 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 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 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1](P237)], 是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原则是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 “唯物史观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2](P366)]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都把外部构造当成了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唯物史观有别于其他社会学理论的基本, 是它强调社会内部深层次的构造。它承认社会是“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

^{*} 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学社成员改良思想的理论特色与当代价值”(项目编号: 10QN034) 的阶段性成果。

成”^{[1] (P241)}。人类为了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必须参加社会生产,这一点与人的意志无关,是出于人生存的现实需要。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各种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现象是所有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而且经济现象的发展进步是不可抗拒的。“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2] (P368)}只要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动,那么位于其表面的法律、政策、意识形态都要随之发生变化,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向。

唯物史观揭开了社会进化的规律。这里的“社会”,是全体人民的社会,以及为了全体人民的生活而获得的制度。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广大劳动阶级与经济生产活动直接相连,中国新制度的建立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完成。政治变革要顺应经济的要求,就必须与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唯物史观就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2] (P363)}

中国以往的民主革命者,忽视了下层民众与社会进步的直接联系,忽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具有更加彻底的革命性。“有人在这社会里只受‘时时恐惧失去已得者’的危险,有人却处于‘一无所有,无可再失’的地位。”^{[3] (P396)}前一种人指的就是资产阶级,他们只能采用弥补的方法改造社会,后一种人就是无产阶级,他们要靠自身的力量推倒压迫剥削的政治制度,以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学的真实底蕴只能由后一种方法中见。社会组织的变革需要一些人主动去承担改革的事业,而这些人必然是在现有组织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的社会革命只有依靠处于不利地位的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主义者将党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在了一起。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前,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运动,到工业协会组织中实地调查,在工人建立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宣传无产阶级的力量。1921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明确将“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4] (P4)}作为主要工作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

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的决议^{[4] (P5)}。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进一步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党的建设和党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共二大之后,邓中夏调查了中国产业工人的行业分布状况和党组织建设现状后指出,“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有主力军的地位”^{[5] (P43)}。认清了在革命新形势和新政策下,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二、社会变迁规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社会现象虽然纷繁复杂,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各种现象之间有相互的影响,也有必然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不论他怎样复杂怎样各不相同,始终我们能考察得一定的规律。”^{[5] (P410)}社会制度的更迭就是遵循此种规律的。这种制度的发展依然是要由经济构造决定的。而经济构造本身的进化过程又是由什么决定呢?马克思将这个最高的动因概括为“物质的生产力”。李达认为,劳动的社会化,劳动手段的发展,人群的战争,交换范围的扩大,文化的发达都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变动,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生产关系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只能通过科学研究发现这些规律,使社会本质从社会表象中显露出来。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社会变迁规律的认识为社会变革的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李达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阐述了社会变迁的真实原因。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从表面看是政府暴政和人民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但根本的原因是“封建社会组织阻碍新生产力之发达。”当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已经与发展的生产力形成了新的冲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时,工人成为必然的牺牲品,失业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导致社会问题频发。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日渐激化。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时代,少数占有生产工具的人统驭着社会,为私利的竞争盲目生产,导致商品的倾销和对弱小民族的侵略。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侵略和掠夺,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嫁自身危机的后果。“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他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失业问题、劳工运动或民族问题,都是帝国主义的催命符。”^{[6] (P291)}这些现象都是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面对这样的状况,生产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获取政权,从而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秩序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行得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入中国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时。一战之后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并未改变中国危亡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世界寻求援助未果的情况下,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俄国工农政权和社会主义成为热议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上述社会历史现象发展规律的分析中,坚定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凭空建造起来的,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旧经济组织的自然变化和人类社会组织历史的进化都说明“不能不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一战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处境艰难,但却正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财产公有,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病,生产是为了社会需要而不是利润。在分配上没有对剩余价值的掠夺,也没有殖民地的争夺。这样的理想,只有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原则,以客观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依据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的理想激发了当时进步青年的政治热情。已经有建立共产党组织想法的蔡和森总结了世界革命发展的大趋势和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7](P23)}。1921年9月份他在信中再次提到了唯物史观、阶级专政、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在国内一直忙于开展运动的毛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8](P15)}而身在法国的周恩来也强调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结束帝国主义的混战,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在党的“一大”纲领中,明确的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相结合的重大成果。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等同于明确了社会主义理想实现的方式。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则明确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发展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

三、社会变革方法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前,孔德系的社会学已经于19世纪末进入中国,并逐渐在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平台。到20世纪20年代,一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在欧美的著名大学专门学习社会

学^①。孔德系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是对于西方工业化、近代化的思考。两派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社会调查工作。

但两派未能实现联合。孔德系社会学派受美国实证主义研究风格的影响,注重社会现象的调查,主张以社会改良的方式逐一解决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原则,主张从根本上发现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规律。“西方社会学实质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以多方面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机制和方法为对象的,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实质上是一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9]孔德派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重要的分歧,是对革命和改良的选择。以改良为手段的孔德派社会学提倡无产者迅速组织工会,提倡劳动保险和福利政策。在农村倡导普及教育和农业技术。由于没有看到阶级对立中的根本原因是背后的经济结构,所以这种改良的方法只能暂时缓和阶级矛盾,或者是部分的满足劳动者的经济要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揭示了社会构造的核心因素,发现了社会进化的规律,同时也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手段——社会革命。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从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革命的时候就到来了。突变论和渐变论的研究,也为无产阶级革命性提供了依据。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造成质变。而量变转为质变时,产生的是一种突变的跳跃现象。突变论指出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社会里的革命等于自然界里的突变。突变亦并非是说无因而至的现象。革命的渐渐成熟,亦等于水的渐沸以至于变成汽体。社会里的革命是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结构相冲突之时,便不能不发生革命式的突变。”^{[1](P462)}近代中国,各种阶级和派别进行过多次尝试,虽然没能成功地使中国走出困境,但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些努力属于数量上的渐变,为质量上的突变做了必要的准备。在这些改革和革命的尝试之后,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作为进化中的突变必然爆发。

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需要解决,

^① 1930年2月,孔德系社会学派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学组织——中国社会学社,以研究社会学理、社会问题为宗旨,提供社会改良。

就是唯物史观指明的进化规律与主动革命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会使外界质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正确性,同时也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的困惑。就此问题,李大钊说“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2](P364)]在与蔡和森讨论“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时,陈独秀进一步解释了唯物史观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指出进化规律与革命的手段是不矛盾的。“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6](P157)]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在对客观规律的认知过程中,人的意识不是自由的,它必须服从这种社会规律。但是社会现象的发现是经过人的意志的。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人类社会在进化规律之中,不是散漫无序,没有自觉意识的。社会革命就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来改造人类社会的能动反映。新制度的建立需要这样的方式,这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相符合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反对渐进改良的方法,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消灭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的将实行社会革命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并吸取以往政治革命的教训,在工人、农民中宣传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阐明革命的必然性。在革命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党重点强调了武装斗争、军队建设的重要意义,并逐渐摸索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路径。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农村调查,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调查中,毛泽东运用了社会学的个案调查法和统计测量方法,将土地问题的症结从普通社会学者一直关注的“土地利用”中转移出来,强调农村社会的阶级状况和各阶级的现实要求。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协调发展的科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紧密的结合。其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进化和社会变迁方式的认识为社会变革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对这一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灵活运用,丰富其理论成果。其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要求变革的社会意识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发展目标顺应了社会意识和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与中国革命实践进一步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成果。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需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总结经验,将社会发展规律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来,不但解释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回答了怎样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指导。

参考文献:

- [1] 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 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5] 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6]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7] 蔡和森文集:上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 [8]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9] 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N].光明日报,1985-07-29.
- 作者简介:李爽(1979—),女,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穆敏